

天一阁园林营造：意趣天然的水山格局

陈 青 王伊婧 整理



除了注重水环境的营造，天一阁主人还把植物之美与人格品质相联系。(周建平 摄)

主讲人名片

林清清 风景园林学硕士研究生毕业，现就职于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。主攻风景园林历史理论与遗产保护方向，发表学术论文《温州传统风景园林的地域特色调查与研究》，发表期刊论文《浙南泰顺古村落景观营造层次分析》，曾参与《开化林相改造和森林景观建设总体规划》《奉化西北平原低洼区防洪排涝工程景观规划设计》等重要项目。



(天一阁供图)

天一阁的景观营造，讲求以藏书功能为主旨，结合传统的造园手法，营造清幽雅致的园林环境。据清代学者全祖望《天一阁碑目记》载：“阁之初

建也，凿一池于其下，环植竹木……”可见范钦在建阁初期，便已将天一阁的景观与功能统筹考虑，为整体的园林布局打下基础。而天一阁园林景

观的真正形成，则为清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范钦曾孙范光文在修葺天一阁时，“增构池亭”，最终形成意趣天然的水山格局。

谋篇布局

天一阁的空间布局，以藏书功能为出发点，同时兼顾园林景观的营造。在藏书楼的园林环境中，水是必不可少的元素。天一阁在空间布局上同样非常注重水环境的营造。

书楼怕火，为做到以水克火，天一阁自选址开始，便注意

水源的寻找。其建阁于月湖之西，又临近北斗河，形成左湖右河的外部格局。另据民国《鄞县通志》和《宁波府城厢图》所载，天一阁外原有一条既连接马眼漕、菱池，又与月湖、北斗河相通的自然河道。同时考虑到远水解不了近火，为蓄水防火，范

钦又于阁前凿天一池，其东北隅又为曲池，并与外部水系相连，从而形成双重的防火体系。而范钦建书楼，署其名为“天一阁”，也是有“以水制火”之意。天一阁在建造之时，其选址、布局、命名均服从于藏书的功能，在内外空间和寓意上均注重水环境的布置，从而形成了一个绝佳的藏书胜地。

天一阁的空间布局，以泉石为胜。全园以宝书楼为核心，叠

石引水，自北向南形成“山一池一合一楼一池一山”的空间序列。横山范水，宛若天然，古阁幽幽，融于其间，从而达到“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乐”的效果。

阁前南庭讲求的是诗画的水山意境。山石清瘦，以“天一池”为中心，呈环抱之势，向东西延伸两翼，将天一池拥入其中。水池岸线除北侧平整设置护栏，其余三面均与假山相接，错

落有致、相互咬合。假山保留了宋代“叠置结合”的风格，巧妙搭叠，高低错落，取其画意。阁后的北院，则以山石为主景，巍然而立，追求的是自然的山林野趣。假山造型简朴，整体形状近四方形，造型如合地，以敦厚雄浑为特点。山前有一规整石砌花台，共三层，上植花木，与自然的山体相对。假山体量大，山石层层叠叠，山上竹木森森，犹如山林野地。

植物营造

宋代画家郭熙有言：“山得水而活，得草木而华。”天一阁在营造的过程中，非常注重草木的选

择，精于植物配置；营造手法追求顺应自然，拟山林之境。天一阁的植物景观，自造园

伊始“环植竹木”，又经后世的多次补栽，逐步形成了现在古木荫翳的景观效果。花木种类简单朴实，选取易于成活、方便管理的树种，如香樟、柏木、瓜子黄杨、罗汉松等。园中以大量的常绿植物为背景，通过适当的点缀玉兰、木槿、南

天竹、茶花等树种，来达成四季变化之美。同时，植物多数保持自然形态，少施人工痕迹。古人将植物与假山、亭子等园林要素相结合塑造庭院空间，为书楼提供读书、游憩之所。天一阁南庭花木萧疏，树姿自然委婉，采用点植的手法，层

次分明，与山石相配，充满诗画的意境。这种疏朗的种植手法，同时又保证了书楼充足的光线。而天一阁北院的假山上，古木林立，以大叶冬青等为主景，又有大量南天竹、丛竹栽植其上，营造了山林野逸的氛围。

人文意境

传统园林的营造，讲求“文以明道”的理念，把园林的自然美和人文美结合起来。天一阁在构筑之时，同样讲求寓情于景的构园思想。

范钦辞官归里后，致力于藏书事业，于月湖西畔营构天一阁。一方面他希望能通隐于市

井，醉心于咫尺山林之间；另一方面，壮志未酬仕途险恶，范钦将治国理想转化为“藏书立家以传万世”，以诗文书画为娱，将人生抱负寄托于园林中。从范钦邀两位挚友光临天一阁的邀请函《邀虚竹东沙过湖上小启》中也可看出这一点：“节届清和，神当游

衍，爱傍西湖之渚，乃开北海之尊，画栋珠帘，虽远愧于滕阁；瑶台仙舫，或可希于鉴湖。敢修芜楮，敬展私忱，将期奉竹林之清娱，亦以追兰亭之高会……”在这里，园主人的自我价值得到了施展和升华，从而使天一阁的园林景观超越了简单的自然审美，上升到了意境美的高度。

另外，天一阁作为范家的文化场所，园主人还利用模拟的自然山水、人格化的植物景观，营

造修身养性、潜心研读的人文氛围。范光文在修葺天一阁时，叠山构池，希望借清闲的环境氛围来陶冶精神世界。天一阁的园林景观以山池为胜，通过模拟近似自然的咫尺山水来化育人格品质，陶冶情操，进而培养大山大水的仁智之德。同时，天一阁的园林花木在种植之时也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。纵观全园，以樟、竹、松、柏为主。《南史·王俭传》载：“宰相之门也，枯柏豫

章虽小，已有栋梁气矣，终当任人家国事。”可见樟自古有贤者栋梁之意。而竹则有“经寒不动，静处养性”的品格，松柏有坚韧不拔之秉性。利用植物的人格化处理，把植物之美与人格品质相联系，并通过“君子比德”的方式，在自然花木的审美情趣中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。（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论坛，有删节）

“清代校勘第一人”顾广圻的原则和底线 ——从古籍印本看“顾校”

顾 玮 吴央央 整理

什么是“顾校”？中国曾经有过一位伟大的校勘学者，叫顾广圻，字千里，吴县人。他的校勘方法，见于中国大学的文献学教材，称为“以不校校之”。他是清代校勘第一人，一生校勘了160多部古籍。

我们所说的“顾校”，有多种表现形式：第一种，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顾广圻的手校本。在今天的拍卖市场上，它们是非常昂贵的，一部古书中如果顾氏的校笔较多，可达上千元的价格；第二种，是作为定型文本的《校勘记》。顾广圻创

立了“以不校校之”的方法，在正文当中尽量不改或者少改。那么改动放在哪里？放在书后《校勘记》中；第三种，顾广圻自己刻过一些书，即顾氏思适斋刻本，当时一些有名的收藏家、官员刻书，也会邀请顾氏负责校勘。这些印本也成为

今天我们研究“顾校”的重要部分。

研究顾广圻的校勘，须将以上这三方面内容——他的手校本，以专著形式存在的《校勘记》，以及他在印本上所做的改动，结合考察，才是完整的。



宋八行本

宋十行本

明吴元恭本

清顾广圻本

(郭立暄 供图)

“顾校”择善本而改

第一个例子是顾广圻自刻本《尔雅》。在明刻本中，嘉靖吴元恭刻本《尔雅》一向以精雅著称，顾广圻在清嘉庆十一年（1806年）重新翻刻了明吴元恭本。吴元恭本有嘉靖十七年（1538年）吴氏自序，但这篇序经常被抽掉以仿冒宋本。顾广圻刻的早印本里就没有这篇序，为

什么呢？我认为他一开始拿到的吴本就没有序。顾氏后来见到海宁陈鳧藏吴元恭本有这篇序，很郑重地将其补上了，还亲自写了一段题记刻入：“己巳（1809年）二月，借到海宁陈简庄征君本补完此序，刊附于后。思适居士又记”。从书影可见，这段题记属于顾氏自书上册。

连原序都要郑重地去寻求补入，说明他对这个本子是看重的。基于这一事实，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，顾本是明吴元恭本的忠实复制品。其实并非如此。在说明顾广圻怎么刻这部书之前，需要先介绍一下《尔雅》的宋本。现存的宋本《尔雅》，至少有两种，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本系统：一是宋刻八行本，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；二是宋刻十行本，现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。其中宋刻十行本里有两个

“顾校”充分体现宋本的优点

第二个例子是吴瞿刻本《韩非子》。《韩非子》在明代后期文字上已多有缺误，以万历赵用贤刻本最为著名。清嘉庆年间，吴瞿想重刻这部书，请顾广圻担任校勘工作。当时顾氏校勘此书有一个很好的

条件，就是还有办法见到宋乾道黄三八郎刻本，以及出自这个宋本的影宋抄本。如今，宋本已经失传，影宋抄本则至少有两部可见：一部经黄丕烈校过，《四部丛刊》曾据印，今存北京国家图书馆；一部是张敦

仁家抄本，经顾广圻校过。二者是各自独立地从宋本抄出的。抄本多少会有一些误字，但既然有两部独立形成的影宋抄本存在，我们就有了比对的依据。如果某处文字，两部影宋抄本不约而同地作某字，那么可以推论，宋乾道本大概也是这样。从文字方面看，有学者已发现吴本有一些改动。比如吴本卷6

“顾校”有所改，也有所不改

第三个例子是顾广圻晚年的一部作品，他为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汪士钟校刻的《仪礼疏》。在清代中期，经书通行的读本是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已将经、注、疏合在一起，由于在拼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文字讹误，所以给读者理解带来不少困扰。要解决这一问题，最好的办法是找到未拼合以前的单注本、单疏本，顾广圻校刻的

《仪礼疏》，就是一个单疏本。《仪礼疏》单疏本在当时还有宋本存世，虽然缺失了6卷文字，印刷也比较晚，有文字漫漶缺失之处，但它的存在，对于校勘《仪礼》通行注疏本中的疏文部分帮助很大，顾广圻屡次夸它“在宋槧中为奇中之奇，宝中之宝，莫与比伦”。这里，必须要提到天一阁收

藏的珍贵版本——顾广圻手校北监本《仪礼注疏》，原为甬上著名藏书家朱鼎熙的藏书，后捐赠给天一阁。

《仪礼注疏》中顾氏校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第一，明显的错误，顾广圻照例改了；第二，因为这个宋本是后印的递修本，顾广圻根据经验判断有些错误在宋刻初印本中所无，是后来修补的工人因为操作失误才出现的，遇到这一类错误他也动手改正；三，看一个例子。顾校《仪礼注疏》卷1《士冠礼》疏“若士之

印：一是“吴仲内印”，吴仲内就是吴元恭，这说明吴元恭当年刊刻《尔雅》，至少是看过这个宋本的；二是“顾千里经眼记”印，说明这部宋本，顾广圻也见过。

比对吴本与顾本，我们会发现两者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比如卷3第11页8行小注，吴元恭本作“叶细而岐锐”，意思不好理解；顾广圻本作“叶细而岐锐”，意思是叶子比较细，分杈很尖锐。为什么文字会不一样？查宋刻十行本，为“叶细而岐锐”；再

第2页第13行“妄意度也”，是“虚妄”的“妄”。黄校影宋抄本作“忘”，顾校影宋抄本也作“忘”。我们可以据此认为，宋乾道本此处正作“忘”。仔细观察吴本，此处“妄”字与上下文字的深浅程度不一样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“妄”字是后来挖补的。这个位置原来是什么字呢？我认为当是“忘”字。

吴刻《韩非子》卷末附有顾子，则四十强而仕”句，顾广圻有一条亲笔书写的校语云：“‘若’下当有‘非’字”。这是顾氏个人的判断，他根据自己的学术训练，认为应该如此。有没有版本依据呢？估计是没有，故此处修改意见在汪刻中就没有体现。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，当底本是一个宋刻递印本时，顾校的改动力度不小，尤其对宋本在修补中产生的错误，改动更明显。而在校勘过程中的个人推测，如果没有版本依据，则不加以修改。

查宋刻八行本，作“叶细而岐锐”。像这样的差异在全书可以找到很多处，这说明吴元恭本与宋刻十行本文字很接近，顾广圻翻刻时做了改动，但他的改动并非随心所欲，而是有版本依据的。具体地说，顾广圻往往是照着宋刻八行本系统的本子改动文字的。

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，当底本是一个明刻本，哪怕它是影宋本，如果另外有一个善本可据时，顾校改动力度还是挺大的。

广圻撰写的《识误》，里面严厉批评了赵用贤刻本的妄改之过。认为宋本即便有错字，从中还可以推导出正确的文字。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，当底本是一个宋刻早印本，并且是孤本时，顾校改动较少，而且改动的多是他认为显而易见的错误，特别是形近之误。顾氏似乎认为，把宋本的优点充分体现出来就可以了。

以上三个例子，分别代表三种底本类型：明翻宋本、宋刻早印本、宋刻递印本。从中可看出“顾校”的某些原则：校改与否，似乎基于他对底本文本权威性高下的判断。

顾广圻是怎样一个人？在我眼中，他是一个有原则、有底线的人，他不是我们想象的机械复制者。他的“以不校校之”其实有着很丰富的内涵，他有自己所坚持的立场。

（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·国学堂，有删节）



(楼卓怡 摄)